

村上新作： 小说的构思来自柏拉图的 “三张床”命题

记者：林先生您好，这次版权和翻译重新回到您手里，有何感想？对以往的翻译策略和文体有调整和修正吗？

林少华：村上作品是我最先翻译的，版权也是最先通过我引进的。加之我的译文本身似乎受到绝大多数读者的喜爱，我就不自量力，产生了想把村上新旧主要作品的翻译一个人包揽下来的念头。以期保持一桩事业的完整性，也好回报读者的赏识和期待。

但事情不可能一路柳暗花明。由于一言难尽的原因，如你所说，自2008年以来我没能如愿以偿地翻译村上新作《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》。不瞒你说，这曾经让我感到相当寂寞、相当遗憾。

因此，当去年5月4日上海译文出版社吴洪副社长专程飞来青岛，当面告知该社拿到了这本书的版权并请我重新出山翻译的时候，我的兴奋之情难以言表。

记者：这部作品比村上过去的作品更加哲学和形而上学了，您是怎样理解这种风格的？

林少华：理念是整部小说的关键词，第一部的名称即是“显形理念篇”，正文有时释之以“观念”。idea是柏拉图哲学的核心理念。柏拉图由此提出“三张床”命题。

第一是idea即理念世界，乃一般情况下无法看见的世间万物的原型。第二是现实世界，各类工匠、手艺人制造的所有东西都是对万物原型之理念的模仿。第三是艺术世界。这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，由此构成关于世界的虚幻镜像。

在《刺杀骑士团长》里面，骑士团长是idea(理念、观念)的化身，以idea自称；“我”及所有出场人物及未出场人物制造的所有东西自是现实世界。其中免色涉的白色宅邸和“我”发现《刺杀骑士团长》那幅画的别墅，尤其似并非井的地洞或可视之为对idea原型的模仿。而绘画作品《刺杀骑士团长》和“我”创作的所有肖像画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或艺术再现抑或隐喻，小说第二部的名称即“流变隐喻篇”。

由是观之，整部小说的构思未尝不可以来说来自柏拉图的“三张床”命题，或者说“三张床”的文学演绎。

林少华是国内著名的翻译家，尤以翻译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而为大众熟悉，是中国翻译村上春树作品最多、也是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。

从1989年翻译《挪威的森林》开始，《刺杀骑士团长》已是林少华翻译的第42本村上春树作品。

《刺杀骑士团长》是村上春树七年磨一剑的突破之作，近50万字的大部头，林少华仅用了85天就翻译完成。今年春天，中文译本一面世，便引起中国读者强烈关注，首印达70万册。4月11日，海南日报记者在上海远程连线林少华先生，为读者讲述作品背后的故事。

谈翻译观：
好的译作乃是作者之作和译者之译的天作之合

记者：村上春树也是翻译家，翻译过雷蒙德·卡佛全集、《麦田守望者》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等美国文学作品，您与他的翻译观有何异同？

林少华：2003年初第一次相见的时候有过交流。我说翻译他的作品始终很愉快。因为心情上文笔上有息息相通之处，总之很对脾气。他说他这方面也有同感，倘若不合脾气，就很累很痛苦。

关于翻译，村上有个说法：“翻译这东西，原本就是将一种语言‘姑且’置换为另一种语言。哪怕再认真再巧妙，也不可能原封不动。翻译当中必须舍弃什么方能留取保住什么。所谓‘取舍选择’是翻译工作的根本概念。”换句话说，翻译过程中难免流失原作若干审美信息，同时增添某种审美信息——如何保持二者微妙的平衡，即是取舍的原则或标准。

记者：有人认为您的译本风格华丽恣肆，我们看的不是村上的作品，而是林少华的作品。您怎样看待这种说法？

林少华：恕我冒犯，说拙译风格华丽恣肆未免有失偏颇。我自以为拙译较好地再现了原作文体的三个主要特点：简洁、幽默和节奏感。当然，这种再现顶多做到“较好”，而百分之百是不可能的。

按照村上的“翻译观”，“哪怕再认真再巧妙，也不可能原封不动”。村上还有个说法，译者哪怕再要扼杀自己的文体，也还是有扼杀不掉的部分剩下来。而剩留下来的一小部分，可能就是译者的风格。

换成我的表达，好的译作乃是作者之作和译者之译的天作之合。即作者文体和译者文体两相融合的产物。融合得好，相得益彰；否则，两败俱伤。

记者：您翻译过夏目漱石、芥川龙之介、川端康成、井上靖、东山魁夷等名家作品，您是如何把握不同作家作品风格的？

林少华：用兵之妙，存乎一心。同样，翻译、尤其文学翻译，用笔之妙，存乎一心。无非因势利导，随机应变，并无刚性操作规范可循。说白了，译漱石则随漱石，译芥川则随芥川，译川端则随川端。如影随形，曲尽其妙。仅此而已，岂有他哉！

(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汪荣博士对本文采访亦有贡献，特此鸣谢。)

翻译家林少华谈文学翻译： 如影随形，曲尽其妙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

林少华在他的书房“窥海斋”。

村上春树： 《奇鸟行状录》是村上创作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

记者：从《且听风吟》《挪威的森林》到《奇鸟行状录》《海边的卡夫卡》，再到《刺杀骑士团长》，您最喜欢村上的哪一部作品？

林少华：以《奇鸟行状录》为界，村上的文学创作可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。

前一阶段主要通过个体心灵的诗意图来获取灵魂的自由，即所谓“小资”阶段；而从《奇鸟行状录》开始进入后一阶段。其创作主题转为“介入”，即通过追索个体与体制之间的关联性来争取灵魂的自由。

如果问我村上作品中最佩服哪一部，我会毫不犹豫地举出《奇鸟行状录》。这是

一部真正的鸿篇巨制，日文为上中下厚厚三大卷，译成中文都有50万言，达650页。时间跨越半个世纪，空间远至蒙古沙漠和西伯利亚荒原。出场人物众多，纷至沓来而各具面目；情节多头推进，山重水复，雾锁云笼。

更重要的是，在这部作品中，村上完全走出寂寞而温馨的心灵花园，开始闯入波谲云诡的广阔沙场，由孤独的“小资”或都市隐居者成长为孤高的斗士。在这点上，我很赞同哈佛大学教授杰·鲁宾的见解：《鸟》“很明显是村上创作的转折点，也许是他的创作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”。

关于自己： 不愿意失去讲台和学生，教书是树人，译书也是树人

记者：在教师、翻译、作家与学者这四种身份中，您最喜欢哪种身份？

林少华：我还是最喜欢教师这个身份。不用说，没有永远年轻的老师，只有永远年轻的学生。而同年轻的学生在一起，自己每每产生一种美妙的错觉：我还不老！常言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，莫非近年轻者年轻？

不过作为状态，我则喜欢这四种身份的组合。比如翻译完了去上翻译课，可能正好用上翻译当中的某个句子作例句；写完学术文章去讲日本文学概论，对某个观点的讲述就可能更有深度。另外，写完一篇散文偶尔拿到课堂上趁机显摆一下也很爽啊！其实，如此过程也是一种节奏、一种

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。

所以，在一定程度上我是不太情愿退休的——不愿意失去讲台和学生。

记者：您曾说过世界上最好的事情有两件：一是种树，二是教书。那您是怎样走向翻译家之路的？

林少华：种树是树木，教书是树人。而译书实质上也是树人。至少，刚才说了，译书对教翻译课有直接帮助。此外作为大学生课外阅读的专业性读物，我还译了十本汉对译本文学名著。由此稍稍延伸，就顺理成章地走上了所谓翻译家之路。迄今为止，已经译了不止八十本书，其中村上作品42本。第42本就是《刺杀骑士团长》。



《挪威的森林》



林少华(右)和村上春树合影。